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3.003

毛泽东文化观与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同构性^①

郑东艳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1100)

摘要:毛泽东文化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文化基因、理论根基、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同根、同源、同向的内在同构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中探寻固有的规律性,对于毛泽东文化观的传承,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从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习近平;文化;同构性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3-0018-08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化观。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是我们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认识新概括,也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尽管毛泽东文化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生成的历史时期和面临的时代使命有所不同,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理论的一部分,它们在文化基因、理论根基、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同根、同源、同向的内在同构性。深入分析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对于推动毛泽东文化观的传承,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从而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化同根

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为毛泽东、习近平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基因,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文化观和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历史根脉。

(一) 重视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是吮吸着中国传统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的思想之根深深扎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启蒙教育阶段,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等经史典籍,还广泛阅读了《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在老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下,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小学》等书籍,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这些都初步奠定了毛泽东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

走上革命道路后,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毛泽东仍然挤出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不仅如此,他特别要求党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学习传统文化,告诫大家“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非凡复杂的工作中,一直坚持学习和研究

^① 收稿日期:2018-01-23

作者简介:郑东艳(1967-),女,辽宁建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传统文化,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就达9万多册。

毛泽东一生重视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融入毛泽东的血液,成为他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同样,习近平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他在2014年6月6日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说:“中华文明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①因此他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因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②

习近平自己非常钟情于中华传统文化,他在思考中国政治、文化等问题时经常引经据典。如,在反腐败工作中,习近平大量引述中国传统“廉”文化的名言警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直而温,简而廉”,“公生明,廉生威”,“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诛一恶则众恶惧”,“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③。习近平告诫党员干部要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使之成为新时代的反腐利器。

习近平就宣传阐释中国特色,增强“四个自信”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明确要求:“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

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④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深入到习近平思想的深处,并成为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因素。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国人的生活,浸润着中国人的思想,规范着中国社会。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但西方一些政要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只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明确指出,自己之所以看好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独特的价值体系、独特而悠久的历史精神世界,使中华文化不会成为其他文化的附庸,而能在独立自主的轨道上实现自我革新和发展^⑥。

当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全盘吸收,必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⑦

对如何传承、发展、用好传统文化,习近平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法,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习近平指出:“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的土壤里生

①《习近平谈文化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9日。

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这样为传统文化“代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29/c_1121054808.htm2017-05-29。

③《解码习近平的传统文化情结》,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10/c_128921853.htm2016-06-10。

④《习近平谈文化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0月9日。

⑤《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⑥参见王蒙:《着眼民族复兴伟业 推进文化发展繁荣》,《人民日报》2016年9月19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长起来。’”^①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②上述思想说明,习近平正是运用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历史继承性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厘清了从中需要吸收什么,摒弃什么,改造什么,从而更好地完成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 理论同源

毛泽东文化观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哲学的角度对文化概念有一个十分经典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③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述是习近平思考文化问题的基础。

首先,经济是基础,决定着政治和文化。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所以,解决人的吃饭问题是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改造中国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这里初步揭示了物质生活条件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又进一步阐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认为在全部社会制度中,经

济制度是基础,是最重要的。他还认为,在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各方面中,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具有决定意义,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同,政治地位也不一样。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由于霸占了土地、机器和厂房等生产资料,从而垄断了教育和知识,建立起镇压人们的军队。他们正是以“知识”(即思想统治)、“金钱”(即经济统治)、“武力”(即政治统治)三种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④。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政治(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和文化(知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批判了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又说:“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⑤这是最通俗地说明经济是基础的道理。

经济是基础,是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决定因素。这是毛泽东解决文化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理论基础。

其次,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政治和经济制约着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⑥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的文化总是占有统治地位,这是由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所以,“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④邓力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中央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页。

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②

旧政治和旧经济是旧文化的根据;新政治和新经济是新文化的根据。要想铲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推翻旧政权和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政权和新的经济制度。在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全面建设新文化的。反过来说,一定的新文化必须同一定的新政治和新经济相适应。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既应该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该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③如果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那就犯了“左”的错误。

最后,观念形态的文化具有伟大的影响和作用。毛泽东在肯定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指出,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起着“伟大的影响和作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他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④毛泽东在这个讲话

中,充分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他指出革命文艺,“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所以,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像战士一样,用笔参加抗日斗争。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⑤。

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上述思想。他指出:“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反过来也会促进物质文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⑥。

此外,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了文化对经济、政治的作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充分发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今天所具有的伟大智慧,也需要充分运用中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70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

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188页。

民族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是中国人民世代形成和积累的,我们要总结发扬,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①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既要反对把文化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也要反对忽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机械唯物论。因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和习近平正是依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思考文化和解决文化问题的。

三 价值同向

“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和习近平共同坚持的文化价值取向。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论述:“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②可见二者在文化价值上的同向性。

(一) 价值创造——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文化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创造了文化,这是人民群众应当享有文化权益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所在。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③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艺尽管在形式技巧等方面还很“粗糙”,不够精致,但是,由于劳动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对社会实践生活有着最多、最

真、最深的体验,因而他们的文学艺术包含着一切真实的、优秀的文学艺术的灵性、因子和精华。因此,在这点上任何一种文学艺术都不能与劳动者的文学艺术相提并论。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的艺术家。”^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思想相通的论述:“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所以,“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的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习近平也像毛泽东一样号召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所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⑤。

综上,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强调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他们是文化的主人,理应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理应有权享有文化。

(二) 价值体现——文化必须为大众服务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从实践观、价值观的高度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同时也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页。

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①毛泽东坚决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大力提倡文化的民主化、大众化。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而非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②，“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既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

习近平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所以他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题,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④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⑤所以,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三)价值实现——先普及再提高的方式使文化服务于群众

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引用了蔡特金的《回忆列宁》中的一段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在此批注道:“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

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艺术的传播而‘联合起来’,这就是普及和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⑥毛泽东这里提出的是文化如何服务于群众的问题,即应通过先普及再提高的方式使文化服务于人民群众。

鉴于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下,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毛泽东提出首先要在他们中“进行一次普遍的文化启蒙运动”,使他们“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提高。而这种普及和提高的工作必须从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他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⑧进而毛泽东阐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二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毛泽东把文艺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当中去,在肯定文艺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着重加强了对普及性的要求,他希望文艺的普及能够帮助当时实际的军事斗争。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们用“下里巴人”的作品进行“雪中送炭”。这种方式是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的,在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时代背景下,工农兵文化低下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进行启蒙运动,帮助其掌握必要的知识文化,提升其工作战斗的热情与信心,能够更好地帮助其进行战斗。

毛泽东这里强调,要将文艺进行改造使其能够适应普通群众的需要,开展一个普遍的文艺启蒙运动。这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来说,真正具有了文化革命的意义。

在这个方面,习近平传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315页。

⑥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页。

思想。进入新时期,普及已经不是第一要务了,人民更加渴望的是提高,是更多的高质量、高情趣、高品位的优秀文艺作品。正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用精品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而“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优秀作品不应仅仅是包含一个内容的,其中应该包含各个层次,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为此,习近平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①。

当然,习近平之所以把提高放在首位,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的普及工作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人们对文艺的要求开始提高,事实上,普及与提高之间的主次之分并没有优劣对错,都是发展文艺的重要手段和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而产生的不同的要求,而主次的调整正说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进步、国力的强大。

普及也好,提高也罢,都是指文化如何服务于人民,即特定时期文化价值的实现形式,都体现了毛泽东、习近平“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

四 启示

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重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对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文化建设必须以人民为本位

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文化观的重要特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重要特征。毛泽东

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我们的文化就是“应当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习近平更是把“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②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他在十八大以来的历次讲话中,“人民”都是最突出的关键词。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③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习近平又多次提到以民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④等等。这样的执政理念必然体现在以民为本的文化建设之中。

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反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人民性。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思考和解决中国文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容或形式来说,都有两个来源: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形态,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过去社会的某些意识或材料;形式上,主要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方式、

^①《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xijiping/2015-10/15/content_40390597.htm, 2015-10-15。

^②《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

^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7年8月3日。

^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node2/n4/n6/u7ai173782_K4.html, 2013-11-18。

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它们进行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两个来源,任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都无从谈起^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习近平自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这是我们今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与根本宗旨。

如今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

出现于世界”^②。而培育这种“高度文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为,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世界上的其它文明,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面临着这种泥沙俱下的局面,我们更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③这为我们今后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所以,我们既不能非理性地排外或对自身文化全盘否定,也不能对外来文化简单照搬。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理想、文化理想与现代民主、法治、文明等理念的对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The Homoorganicity Between Mao Zedong's Outlook on Culture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or a New Era

ZHENG Dong-y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00, China)

Abstract: Formed in differently historical conditions, both Mao Zedong's outlook on culture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or a new era are of internal homoorganicity in cultural gen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featured by the same root, source and direction. In the newly historical period, it is of importantly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us to inherit Mao Zedong's outlook on culture, better enhance the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drive,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Xi Jinping; culture; homoorganicity

(责任校对 廖和平,朱正余)

^①萧前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6 页。

^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9/17/content_18545188.htm,2008-09-21。

^③《深刻把握“三个意味着”的科学内涵》,《人民日报》2017 年 9 月 20 日。